

蒋介石曾查杜月笙的毒业

杜月笙手面之大,无与伦比。上海乃至全国,几乎没有他摆不平的事儿。无论事情发生在哪个角落,只要他一纸二寸宽的条子,任你是军阀、土匪、袍哥、三教九流,都会买他的账。上海几乎所有像样的学校,他都是校董,所有的慈善事业,他都参与。上海的工人罢工,无论在北洋时代,还是国民党时代,都是靠杜老板的接济才撑下来。当然,最终劳资双方能坐下来谈,也得靠杜老板调停。

有人说,杜月笙是把一个义气的义字,做到绝境的人。民国期间,上至政坛大佬,下至孤儿寡母,受过他接济的人,不可胜数。

但是,青帮毕竟是青帮,尽管杜老板一直在刷洗自己,做了越来越多的白道生意,甚至把自

己的帮伙改成恒社,弟子称为社员,但他依旧是青帮老大。这其中,最大的问题,是贩毒。

当年上海的毒业,主要是贩卖鸦片。进入国民党时代之后,上海的烟土行依旧有将近二百家,被称为特业。而特业的组织特业公会,领袖人物就是杜月笙。从北洋到国民党时期,杜月笙尽管白道的生意越做越大,但却从来没有撒手特业,毕竟,整个上海滩的白道生意,加起来也抵不上特业的一个角。因为,当年的上海,在全国的鸦片销售中,居于龙头地位。单单上海一地的鸦片税收,就可以养几十个师。在国民党统治之初,由于需要跟各个大号的军阀争胜,蒋介石也需要鸦片的收入补充军费,所以,一直对这个老相识的生意,睁只眼闭只眼。

但是,随着蒋介石统治的稳固,他开始需要清理鸦片了。不仅仅是为了面子上好看,而且也是为了正常的经济发展的需要。

当时,不仅上海的要员从市长吴铁城到警备司令杨虎都拿杜月笙的好处,连他们下面的喽啰,也定期接受特业公会的补贴,这种补贴,远远超过他们的工资。至于在南京的政府要员,接受杜月笙招待的,也如过江之鲫。

1936年,原来做过蒋介石侍从副官的蔡劲军被派到上海担任警察局局长,蔡劲军一上任,不再接受特业公会的任何好处。上任几个月之后,突然采取行动,搜查上海滩所有的烟馆,将烟馆的老板全都抓了起来。这让杜老板感到十分没有面子。一来,他一直向这些烟馆老板拍胸



杜月笙

脯,说有他在,不会有事的。二来,就算警察要行动,他也会事先知道,早做准备。然而,这一回,全部落空了。

虽然说,事情发生之后,杜月笙动用了他全部的资源,通过警备司令杨虎的关系,把这些烟馆老板都给放了,但是,经此打击,杜老板觉得,这个生意,看来是没法做了。尽管如此,真正放手,还是到了抗战爆发以后。

据《今晚报》

赵树理和李长之的单方面笔战

“山药蛋派”作家群体与“京派”作家瓜葛不大,但其中两员主将赵树理和李长之,早年却因笔头勤快,相知不多而无端打了一场单方面的笔战。

1934年8月20日,李长之的文章《不成问题》在《北平晨报》副刊第719号“北晨学园”刊登,文中李长之对当时文坛热烈讨论的中国的“伟大作品何以不能产生”的问题,做了激烈批评,他认为那根本不是一个问题。因为“何以没有伟大的作品?很简单,只因为作家根本渺小。”他认为“什么生活压迫,什么文化统治,什么言论不自由”,都是“饰词”和“遮羞”,并举例说明高尔基在压迫中创造伟大作品,因为没有伟大作品,只因为作家本身“不伟大”。

李长之这篇文章,很快被赵树理读到了。于是他很快在自己主编的《山西党讯副刊》8月25日版上以“何化鲁”的笔名发表了《呜呼!李长之之教授》,文中,赵树理反驳李长之:“何以没有伟大的作品”是很值得讨论的问题。他认为高尔基之所以伟大,是因为他经过实际生活的磨砺,而逐渐伟大的,却不像李长之认为是“人伟大,所以虽然受了许多苦,仍然能产生伟大的作品。”赵树理认为的是“中国作家想要有伟大的作品产生,必然的得把现在的生活改变一下,从现实生活中创造自己,创造作品。”

遗憾的是,因为《山西党讯副刊》是当时国民党山西党部的刊物,影响力有限,因而李长之并未作进一步回应。二人的争议由此并未形成你来我往的有趣场面。

从行文看,赵树理称呼李长之为“李长之教授”,显然说明赵树理对李长之的身份很不了解。其实,李长之在1934年,还只是清华大学哲学系一位大三学生。之所以让赵树理误以为是教授,乃是因为李长之还在清华就读时,就十分活跃,不但自己主持《清华周刊》的副刊,还和郑振铎等人一起创办了《文学季刊》。据《人民政协报》

刘邦为何堪称高明政治家



汉高祖刘邦

说起汉王刘邦,不少人赞同“他是一位高明政治家”的评价。确实,刘邦身上具备了政治家所应有的一些基本胸怀和素养。

刘邦虽然出身于社会下层,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,早年在乡间的名声也不怎么好。参加义军、投身于反秦大业之后,给人留下的却是一个长者的印象。也正是这一点,使得他在跟项羽的竞争中赢得了先机。

当时,楚怀王曾与诸将约定:先入关中灭秦的封为关中王。但一些老将认为,关中百姓饱受秦王朝严刑峻法之苦,应当派一位为人宽厚的长者去安抚。项羽为人狡诈残忍,刘邦素来为人宽厚,因此派后者去比较合适。最终,楚怀王决定派刘邦率军入关。刘邦入关灭秦后,不仅对百姓秋毫无犯,而且还与民“约法三章”。百姓持牛羊酒食犒劳,刘邦也婉言谢绝……类似举动赢得了民心,百姓唯恐刘邦不做关中王。

项羽在听说刘邦入关之后,担心刘邦借机称王,赶紧率军入关,但又怕投降的秦军入关后造反,竟连夜将20万秦军降卒全部坑杀。入关后,又杀死了已经投降的秦王子婴,焚烧了王宫,把金银财宝和美女搜刮一空,“所过无不残破”,彻底丧失了民心。在其后的楚汉战争中,虽然刘邦屡战屡败,但在关中百姓的支持下,依托稳固的后方基地,最终击败项羽,夺取了天下。

据《解放日报》

“丰碑”其实不是碑

碑本来指的是没有文字的基石或桩,其主要作用有三:一是立于官庙前以观日影、辨时刻。《仪礼·聘礼》曾说:“上当碑南陈”,郑玄的注释就是:“官必有碑,所以识日影,引阴阳也”。二是竖于官庙大门内拴牲口。三是古代用以引棺木入墓穴。最早的碑上有圆孔,施辘轳以绳被其上,引以入棺也,亦即下棺的工具(和现在工地上上楼板所用的切板机的工作原理很相似)。古时往往用大木来引棺入墓,这大木的特定称呼就是“丰碑”。秦代以前的碑都是木制的,汉代以后才改用石头。

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用丰碑来牵引自己的棺材。《周礼》有云:“公室视丰碑,三家视桓楹。”所谓“公室视丰碑”,就是公室成员死后,要用以大木立于墓圻的四周,上设辘轳,用以下棺于圻。该规格本来为天子之制,后来诸侯也僭用之。即使到了春秋战国时代,对于丰碑的使用范围仍然有着严格的限制。季康子的母亲去世之后,公输般劝说季康子用丰碑来下棺,结果就遭到了别人的一番挖苦(事见《周礼·檀弓》)。

显然,所谓的丰碑在当时的

语境之下,就是一种特殊的葬礼规格。先是只有天子才可使用,后来发展到公室成员,再往后发展到诸侯亦可用。后人沿袭了此种习俗,“旧时王谢堂前燕,飞入寻常百姓家”,普通百姓也学着用起了“丰碑”,他们在自己亲人的坟前立起了石头。只是他们忘了原来的碑是下葬的工具,忘记了碑最原始的功能。

所以,后来有人开始在光秃秃的石头上开始刻字记录父辈的功绩,这就是今天我们见到的墓碑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武则天的无字碑倒是歪打正着,有点符合古礼的要求。除此之外,其他人就显得有些东施效颦了。

据《各界文史》

抗战时日本兵到底有多强

在时下流行的抗日神剧里,神功盖世的“中国人民”玩弄日军如虐杀蚂蚁。一个中国人轻松灭掉成片的日军。当我们触摸那些抗战亲历者的回忆,上至领袖将军,下至普通一兵,对此的记忆却是如此辛酸:日军很强大,为了抵抗他们的侵略,中国军民付出了高出对手数倍的惨痛代价。

为什么一场以大对小的反侵略战争,竟然要打八年。其实真相很简单。抗战时长期担任战区司令长官,对战争了如指掌的张发奎晚年回忆明确表示:“我感觉敌人能攻占任何他们想要的目标;

倘若他们没有占领某地,那是因为他们不想要。在整个抗战期间我思路一贯都是这样。一切都是时间问题。”李宗仁在《八年抗战我优秀之检讨》中说:日本陆军训练之精,和战斗力之强,可说举世罕有其匹。用兵行阵时,上至将官,下至士卒,俱按战术战斗原则作战,一丝不苟,令敌人不易有隙可乘。日本高级将领之中虽乏出色战略家,但在基本原则,绝少发生重大错误。

但从军事斗争角度看,这还不真正是最重要的,最重要的是,日军非常善于“高效作战”。如

果苏军每发射出100发子弹可能会杀伤5名敌军的话,那么,日军的100发子弹就可能杀伤10名甚至20名敌军,也就是说,当年日军的作战效率大约是苏军的两倍以上。抗战初期我们的一个老红军连队与日军作战时,别看日军火力听上去不很密集,但我们那些身经百战动作灵敏的老红军战士,只要是稍不注意,就会被对方击中。日军不仅单兵作战能力很强,而且部队之间的协同配合也很好,不管是步炮配合,还是小范围的组、班(曹)、小队的内部配合,都是训练有素的。不夸张地说,新四军与日军作战,比起与国民党军队作战,真是要难上一百倍。

据《各界文史》

孙中山直到晚上才就任大总统

1912年1月1日,上午10时许,孙中山将从上海乘坐火车北上南京,就任中华民国的首任领袖——临时大总统。

沪军都督陈其美,宣布独立各省的代表汤尔和、胡汉民、宋耀如,以及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宋霭龄等人,也将和孙中山一起同行北上,在与欢送的部分人群合影后,45名来自沪军的敢死队队员,护送着孙中山登上了火车。

从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,孙中山已于当年12月25日抵达上海;12月29日,宣布独立的各省代表,联合选举孙中山为民国的临时大总统,并

定好于1912年1月1日,在南京正式举行就职典礼。但孙中山此后并未立即赶赴南京,因为他要留在上海筹钱。

革命爆发,最缺的,就是钱。早在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抵达上海时,外界就纷纷传言,孙中山带了几千万现金回国,然而当天下午,在面向1万多人的欢迎人群演讲时,此后被称为“孙大炮”的孙中山,却让现场的人群好失望。

孙中山对现场的人群说:“人人均以余带来几千万现款,实则余一文未带。所带来者,仅此革命之精神耳。”

当时,张謇被推举为民国临时政府的事业部总长,根据张謇估计,临时政府每年的开销,至少应为1.2亿两白银;而在听孙中山说没有钱后,留日学生黄尊三更是非常失望地在日记写道:“政府则一钱不名,军队不能养活。中山先生以贫民式之总统,应付颇属困难”。在此情况下,酝酿中的民国政府军心浮动、军队小规模骚乱哗变时有发生,因此临到就职典礼的前一晚,1911年12月31日,孙中山还在上海到处奔走,为嗷嗷待哺的革命政权到处筹款“搞钱”。

1911年12月31日下午,孙中山先是想找他的革命事业赞

助人、日本人官崎滔天借款500万元,没想到官崎滔天回答说:“我又不是魔术师,一下子哪能弄这么多钱?”孙中山不死心,当天晚上,1911年的最后一个夜晚,他又出席了家乡广东香山县旅沪同乡,在上海老靶子路庚虹园酒馆,为他组织的欢送晚宴。孙中山本想到在这里向老乡们也募集一些革命捐款,然而,他再次失败了。

孙中山正式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时间,是1912年1月1日晚上10点多。很多人奇怪,就职典礼和标志民国正式开始的日子,干嘛搞得这么晚,但又有多少人知道,孙中山为了这个新生的共和国,到处奔走筹款的辛酸和无奈? 最爱历史公众号